

《金刚经》与唐朝民众崇经活动及其观念

杨 君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00)

摘 要: 崇经活动是唐时民众世俗佛教生活的中心内容,是当时民风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金刚经》在其中的突出地位值得关注。本文对唐朝民众崇敬《金刚经》活动的主体、形式、轨仪、目的与经书的关系、时代背景等方面作了初步分析,指出是禅宗的兴起促成《金刚经》在民众中的流行,并影响推动其他佛经的民众崇持活动,最终使崇经这种古老的佛教信仰形式成为唐时民众世俗佛教生活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因此,禅宗不是阻碍佛教世俗化的力量。

关键词: 唐朝;《金刚经》;民众;崇经活动

中图分类号: B9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1465(2003)06-0029-05

THE DIAMOND SUTRA AND SCRIPTURES-WORSHIP OF SECULAR PEOPLE IN THE TANG DYNASTY

YANG Jun

(Institute of Dunhuang Studi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Scripture-worship was the central content of people's secular Buddhist lives and one of the important parts of customs in the Tang Dynasty. To these phenomena,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outstanding status of *The Diamond Sutra*.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forms, the rites, the purposes, the backgrounds of the people's activities of worshipping *The Diamond Sutra* in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activities and the scripture. Moreover, the paper thinks that the rise of the Dhyna Sect promoted the spread of *The Diamond Sutra* in secular people, effected others scriptures-worship activities, and in the last made scriptures-worship, which was one of the oldest forms of Buddhism-worship, the most prominent part of people's secular Buddhist lives in the Tang Dynasty. For this reason, Dhyna Sect wasn't the factor which had prevented Buddhism from secularizing.

Key words: Tang Dynasty; *The Diamond Sutra*; secular people; scriptures-worship

唐朝时期,佛教在中国进入极度兴旺发展时期,与此同时,其民间化、世俗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渗入普通民众的生活并发挥重要作用。表现之一就是各阶层民众普遍对佛经进行尊崇与信仰,民众崇经活动极为盛行,成为当时民众世俗佛教生活的中心内容以及民风民俗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而《金刚经》在其中的突出地位值得关注。综合各种史料可以得出结论:《金刚经》是唐朝时期民间最为流行的佛教经典,较之其它佛经,在民众中得到了最多、最广泛的崇护。如《太平广记》中,除零散记载外,有七卷专门记载《金刚经》报应故事,大大多于《观音经》二卷、《法华经》一卷、以及有关其它经书的零散记载,而这些记载绝大多数以唐朝为主要时

间背景,其他笔记小说,以及《法苑珠林》等佛教类书中的记载也与此类似;敦煌文书中所见的唐人写经,以《金刚经》数量最多;从敦煌材料中可以看出《金刚经》是唐时民间作法事时最常使用的佛经之一。《金刚经》为姚秦鸠摩罗什所译,是后来禅宗的重要经典,本文拟对唐朝时期民众崇敬《金刚经》的形式、轨仪、目的、与经书的关系、时代背景等方面作一初步分析。

一、形式及轨仪

唐时民众崇持《金刚经》形式多种多样,但大致以三种为主:诵念、抄写、礼拜,三种形式一般相互交织,有崇经行为的民众往往都有所涉及。

收稿日期:2003-03-10

作者简介:杨 君(1979-),女,四川南充人,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敦煌学、宗教学。

第一,诵念是最为常见的形式。可分为日常诵念与遇事诵念两种情况。当时每日诵念《金刚经》若干遍,坚持数年乃至数十年,总数达万遍者多见于记载。如“唐孙明者,郑州阳武人也,世贫贱,为卢氏庄客,善持《金刚经》,日诵二十遍,经二十年。自初持经,便绝荤血”。^[1]唐代宗时,朔方节度使张齐丘,“酷信释氏,每旦更新衣,执经于像前念《金刚经》十五遍,积数十年不懈”。^[2]史料中大凡记载某人“少持《金刚经》”、“常持《金刚经》”等,都应属于此类。但更多民众只在遇到灾病、故亡、恶兆等各类具体事情时才诵念《金刚经》,或自己诵念、或出资请僧作法事诵念。陇西李消云与妻皆梦鬼来召己,“因大畏恶,遂弃断荤血,持《金刚经》,数请僧斋,三年无他”。^[3]唐吴可久,元和十五年居长安,妻亡托梦,故请僧转《金刚经》。^[4]唐王陀为鹰扬府果毅,因病遂断荤肉,发心诵《金刚经》,日五遍。^[5]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一般情况下将诵念、诵读并称,但二者在民众观念中有高下之分:诵经应高于读经、念经。唐开元年间,李虚入阴间,见有二僧,一常诵《金刚经》,一常念《金刚经》,“王请诵者坐金座,请读者坐银座,坐讫开经,王合掌听之,诵读完毕,忽有五色云至金座前,紫云至银座前,二僧乘云飞去,空中遂灭”^[6]。

第二,抄写《金刚经》也分日常抄写与遇具体事件时抄写两种情况。一些民众常年写经祈福,写经数量较多,如“唐姚待,梓州人,常持《金刚经》,并为母造一百部”,^[7]敦煌文书中保留有一位老人在天祐二年到三年间抄写的大量《金刚经》,如 S.5444、S.5534、S.5965、S.4451、P.2876,其后题记往往有“八十二老人手写”、“老人八十有二”、“八十三老人自手”、“八十三老人写”等内容,且年份、字体相合,可以看出均出自一人之手。但总体来讲,写经所费财资、时间较多,民众一般是在灾病、故亡等特殊情况下才进行写经,尤以为亡父、亡母写经最为普遍,且写经规模一般不大,“唐大理司河内司马乔卿……丁母忧,居丧毁瘠骨立,刺血写《金刚般若经》二卷”^[9]。“唐陇西李度观,今居郑州,至显庆五年丁父忧,乃刺血写《金刚般若经》及《般若心经》各一卷,《随愿往生经》各一卷”。^[10]出资人有时亲自写经,如上引材料中的乔卿、李观、敦煌老人等,但很多情况下是由出资人出钱雇请专门的写经生、经工为己写经,敦煌文书中大量的唐人写经均留有经工题名,即可证明当时这一现象的普遍存在。当时还存在为动物写《金刚经》的情况,笔记小说中此类记载较多,现试举一例敦煌材料,S.5544《金刚经》题记:“奉为老耕牛神生净土,弥勒下生,同在初会,供(共)闻圣法。”同本《佛说阎罗王授记四众逆修七斋功德往生净土经》题记云:“奉为老耕牛一头敬写《金刚经》一卷、《授记》一卷,愿此牛身领功德,往生净土,再莫受畜生生,六曹地府,分明分付,莫更有仇讼,辛未年正月。”学界往往从当时民间佛教信仰的虔诚性、佛教观念深入

人心等方面来探讨这一现象,但笔者认为民众的真正着眼点应在于使牲畜“莫更有仇讼”,以减少自身灾病的可能性,是中国人追求实用、速效的信仰心态的典型表现。

第三,唐时民众供奉礼拜《金刚经》,也可在平时或遇事时进行,但比较而言较为简单,也不甚多见,在此不作详述。值得注意的是:对《金刚经》进行礼拜供奉的,以不识字、自身难以进行诵经、抄经活动的社会中下层劳动人民为主。“唐开行立,陕州人,不识字,长庆初,常持《金刚经》一卷随身,到处焚香礼拜”。^[12]“康仲威,唐元和十一年往海东,数岁不归”,一僧劝其母持《金刚经》,“母不识字,令写得经,乃凿屋柱以陷之,加漆其上,晨暮敬礼”。^[13]又上引姚待条,其为母写经,“有屠儿李迺奴请一卷,焚香供养”。^[14]文化阶层虽也存在礼拜《金刚经》的情况,但非常少见,且往往是针对那些被认为具有神奇效验的经书。元和时江淮人宋衍,为盐铁院书手,有事外出,其妻在家请人为之写《金刚经》,后该经神验救其性命,“衍更呜咽拜其妻,每日焚香礼经于净室”,该经灵验名声传开,相国郑公邠为东都留守,召宋氏夫妇往,给予种种好处,“因求其经,至今为郑氏供养”。^[15]

唐朝民众在崇敬尊奉《金刚经》过程中,有否执行某些佛教的仪轨规定呢?大多数情况下,史料只言某人“虔心”、“虔诚”,至多简要提及崇经活动在净室进行,之前或过程中有沐浴、素食、焚香、叩首等并不复杂的程序,且往往未必全部具备。史料中严格执行崇经仪轨的,基本为僧徒、倡佛文人等上层佛教信仰者,尤以僧徒为多,下引两则材料虽非抄写《金刚经》,但也能说明一些问题。唐县隍禅师欲写《法华经》,“无人同志,如此积年,忽有书生来诣之,仍以写经为请,禅师大欢喜,清旦食讫,澡浴,著净衣,入净室,受八戒,口含旃檀,烧香悬幡,寂然抄写,至暮方出”,^[16]更有甚者,唐武德时河东尼法信,让一经工抄写《法华经》,“特为净室,一起一浴,然香更衣,仍于写经之室,凿壁通,加一竹筒,令写经人每欲出息,径含竹筒,吐气壁外”^[17]。可以推测:较之上层信仰者,广大民众在崇持《金刚经》活动中,对仪轨的重视程度并不是太高。

二、动机与目的

《金刚经》在唐时民间最为流行,与该经简短易持有所关系,但更重要的是,这是当时民众功德观及其信仰心态的直接产物。其一,随着佛教信仰的逐渐深入人心,受因果报应思想的影响,唐朝民众将虔心信佛建立功德看得异常重要,将其与自身及其家人的现世乃至来生的幸福联系到了一起。“功德”本是个虚幻的概念,讲求实用的中国人重视它,其根本着眼点在于他们认为通过功德的积累,便可以换取现世和来生的种种幸福与好处。其二,崇敬佛经在当时被视为建立功德的有效途径。有一则材料甚有说服力:许至雍与亡妻相

见,“许生又问:‘人间尚佛经,呼为功德,此诚有否?’妻曰:‘皆有也。’”^[18]从史料反映,当时将各种崇经行为都称为功德。其三,当时民众认为崇敬《金刚经》在建立功德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至高地位。“唐李丘一好鹰狗畋猎,万岁通天元年,任扬州高邮丞,忽一日暴死”,入冥间见阎王,“王曰:‘曾作何功德?’云:‘惟造《金刚经》一卷。’王即合掌云:‘冥间号《金刚经》最上功德,君能书写,其福不小……’”^[19]唐开元中,有卢氏被鬼吏追至冥府,见亡故表兄,谓其曰:“弟之念诵,功德甚多,良由《金刚经》是圣教之骨髓,乃深不可思议之功德者也。”^[20]崇持其他佛经,功德均不及此经,“唐大和五年,汉州什邡百姓王翰,常在市日逐小利,忽暴卒,经三日却活”,言于冥间见其亡兄,兄言其往日所杀牛、狗诉其罪状,且今名未注死籍,若为作功德,尤可以免,“翰欲为斋,及写《法华经》、《金光明经》,皆曰:‘不可,’乃请曰:‘持《金刚经》七遍与之。’其兄喜曰:‘足矣。’及活,遂舍业出家”,^[21]故该经在当时有功德经之称。^[22]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是《金刚经》的“最上功德”让其获得了最多的崇敬,“最上功德”意味着可以获得最多的好处,《金刚经》的巨大吸引力正在于此。从史料分析,唐时民众认为通过崇敬《金刚经》主要可以获得以下三个方面好处。

第一,延长性命。“易州参军田氏,性好畋猎,恒养鹰犬为事”,唐天宝初,偶得一卷《金刚经》,后发心持读,至二千余遍,亦不废畋猎,后暴卒至地府见所杀鸟兽,从己徵命,“王问在生作何福业,田氏云:‘初以畋猎为事。’王重问,云:‘在生之时,于易州棘上得《金刚经》,持诵已二千余遍。’王云:‘正此灭一切罪。’命左右检田氏福簿,还白如言,王自命田氏诵经,才三纸,迴视庭中禽兽,并不复见,诵毕,王称美之,云:‘诵二千遍,延五十年寿,’遂得放还”。^[23]文献中类似材料甚多,当时该经甚至被称为阴间之“续命经”,其延命作用在民众中的影响可见一般。

第二,早脱地狱、早获投生或者往生。上文曾述及唐朝民众多为亡父母抄写《金刚经》,或为动物写经,原因即在于民众中存在此种观念。文献中材料甚多,现试举一例,上文所引卢氏条,其下云:“卢初入院中,见数十人,皆是衣冠,其后大半系在网中,或无衣,或露顶,卢问:‘此悉何人?’云是阳地衣冠,网中悉缘罪重,弟若能为一说法,见之者悉得升天。遂命取高座,命卢升坐诵《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网中人已有出头者。至半之后,皆出地上,或褰衣大袖,或乘车御云,诵既终,往生都尽。”

第三,免除灾病。较之前述内容,这一功效与日常生活联系更加紧密,内容也更加宽泛,上文曾论及唐朝民众日常或者遇事时崇敬尊奉《金刚经》,其目的大多是为祈求免除灾病。唐朝民众认为,通过崇持《金刚经》,各种灾病都可安然

度过,主要类型有:各种病患、外伤可以痊愈;乘船遇狂风、行路遇劫匪、入山遇猛兽可以平安无恙;入狱遭禁则可以镣锁自脱。现试举几例:唐大历时,健儿张国英被箭射中,医生言其必死,但因其长持《金刚经》,“至夜梦一胡僧与一丸药,至旦,泻箭镞出,疮便合瘥”。^[24]唐白仁哲,龙朔中为虢州朱阳尉,过海遇风,“急念《金刚经》,得三百遍,忽如梦寐,见一梵僧,谓曰:‘汝念真经,故来救汝。’须臾风定,八十余人俱济”。^[25]又“唐长安县死囚,入狱后四十余日,诵《金刚经》不辍口,临决脱枷,枷头放光,长数十丈,照耀一县,县令奏闻,玄宗遂释其罪”。^[26]

上述三类好处是崇持《金刚经》的唐朝民众所真正关心的重点。总体来讲,民众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今生崇经建立功德,以获取在现世、来生的尘世生活中过上福寿安康的好日子,相比较而言,通过崇经往生极乐世界的概念对大多数民众来说是比较淡漠的,应该只对虔诚信徒才具有吸引力。

三、经文、教义分析

作为一种禅宗经典,《金刚经》主要论述了“所言一切法者,即非一切法”,一切现象“性空幻有”等佛教教义。^[27]上文论述了《金刚经》在唐朝民众中流行的基本形式及其对民众而言的主要吸引力。以下笔者将从几个方面来探讨《金刚经》的经文、教义与上述内容的联系。

第一,《金刚经》前有启请,包括香讚、四真言、开经偈等众多内容,且有规定:“凡受持是经者,于未诵时,先须表里兼净,屏气凝神,启诵祝香讚,净口业、安土地真言,虔请佛菩萨金刚宝号,叩首,默诵心经全卷,西向趺坐,手拈大三昧印,澄心闭目……”,此后还涉及结印、颂发愿文、真言等众多内容,在此不作一一抄录,但其后又言:“以上咒印,专为用功悟道者而设,如不能观光持咒,但诚心持诵,融会经义可也。”^[28]上文曾论述了唐时民众在崇敬《金刚经》活动中对仪轨不甚重视,与经书中相关内容进行比较后可以发现:民众以自身的需要为出发点,对经书所规定的仪轨进行了筛选,将不易施行的部分加以省略,只保留简单易行的部分,对此,佛教采取了默许乃至承认的态度。崇经活动仪轨的简易化以及得到佛教承认,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各种形式崇经活动在民间的普及。

第二,与许多佛经类似,《金刚经》多处极言其教义深邃。“须菩提,一切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此经出……”;“……尔时,须菩提闻说是经,深解义解,涕泪悲泣,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闻如是之经……’”;“须菩提,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果报亦不可思议……”。及崇敬该经的巨大功德、福德,“……若後有人,于此经中,乃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其福甚多……”;“当来之世,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此经受持读诵,

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须菩提,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为发大乘者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见,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量功德,如是人等,则为荷担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唐朝民众观念认为《金刚经》是“圣教之骨髓”,具有“深不可思议之功德……”乃至“最上功德”,应与上引内容相关。值得注意的是,经文中只是宣扬该经教义深邃、功德巨大,并未将其教义与功德明言为“最上”或者“第一”,这应是被后人夸张后添加的内容,因为中国民众认为功德即好处,最大功德自然有最大的吸引力。

第三,通过崇敬《金刚经》可产生种种异相,崇经人可获得某些福报,《金刚经》中对此也有少量述及。主要内容如下:“……复次,须菩提,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则为有佛,若尊重弟子……”;“……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当知此处,则为是塔,皆应恭敬,作礼围遶,以诸华香而散其处。复次,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轻贱,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金刚经》启请中有奉请八金刚、四菩萨的内容,大致有使其护佑的意味。可以看出:这些内容在经文中数量不多且虚幻空泛,基本没有涉及对民众具有真正吸引力的各种好处的具体内容。那些具体的好处,应是以民众喜好为依据,对具有神秘性的上引内容进行派生、演绎后的结果。

第四,福慧双修是《金刚经》阐述的重要教义,经文中九次将布施与崇持该经进行比较,指出真正的大功德、大福德是智慧的成就,是不住相布施。应通过尊奉佛经达到对教义的深刻把握,达到理论上的升华,不要仅仅局限于以建福为目的的财物乃至生命的布施,以修慧为目的的崇经应得到更多的重视。现摘录其中两处:“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便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遂,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于燃灯佛前,得值八百四千万亿那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承事,无空过者。后复有人,于后来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万亿分,乃至算譬喻所不能及”。此种内容除继续加强对《金刚经》功德、福德巨大的阐述外,还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其一,是很重要的一点:《金刚经》中对于崇持该经功德、福德甚于布施的反复阐述,通过上层信仰者的宣传以及民众的自我理解,应是唐时民众崇持

《金刚经》活动的重要理论依据,并且有理由相信,作为崇敬三宝之一,崇经活动虽然自佛教传入起就有存在,但这种有教义支持的崇经活动,影响并推动了对其他佛经的尊崇,并最终形成了以崇持《金刚经》为主干的唐朝时期异常兴盛的民众崇经活动。唐时民众崇经活动能在建立功德的众多形式中取得主导地位,跟《金刚经》中反复宣扬的此种内容关系极大,何况较之布施等其它建功德形式,崇经的简易性、廉价性、可操作性非常突出,完全符合中国民众实用主义、简易主义的要求,更易得到民众的接受。其二,《金刚经》中所反复强调的崇经,应是指对佛经中所渗透教义的理解乃至升华,以达到“慧”的境界。而各种史料都明显表明:受这一理论影响的唐朝民众崇持《金刚经》活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以脱离了修“慧”的范畴,变得形式化、庸俗化,追求的只是形式上的崇经以建立功德,获取好处,至于教义有否理解根本不是关心的重点,这其实完全违背了“福慧双修”的教义,走向了经文中所反复反对的住相布施。当时受其影响的崇敬其他佛经的民众活动,也同样呈现此种情况。其三,《金刚经》中实际上已经列出了各种崇经形式: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听人讲诵等。上文曾论述了民众崇持《金刚经》的三种基本形式,这应是对经文中所列内容加以筛选后的结果,而筛选的依据,即是中国民众观念中万变不离其宗的实用主义、简易主义原则,那三种形式明显更易于操作,更符合民众的崇经条件与文化水平。

综合上述内容,唐朝民众崇持《金刚经》的形式、仪轨、目的、理论依据等,在该经经文和教义中均可以找到或多或少的根据,但这种联系并非是一一对应的,相反,存在若干相当引人注目的变更,其一,这些变更,都是在《金刚经》经文、教义中的相关内容的基础上加以筛选、夸张、演绎、改变后得到的。其二,这种变更,非常明显是以民众的普遍需求与喜好作为基本依据,具有极其显著的实用性、简易性特征。其三,这种变更的主体及其途径。首先,作为上层信仰者的僧徒与倡佛文化阶层,出于自神其教、更大限度吸引民众参与、加深该经及佛教影响的目的,按照民众需要的形式和内容对该经进行理解和改造,并广为宣传。其次,民众在日常宗教实践中依据自身要求和喜好,接受上层信仰者的改造,同时对该经进行的无意识的自我改造。《金刚经》的经文、教义最终演变为唐时民众崇敬尊奉该经过程中的种种活动与观念,是上下层佛教信仰者在实用主义、简易主义的支配下,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

四、背景与结论

第一,唐时经济、文化的双重繁荣,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的初步发展;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纵深发展以及初步世俗化,给唐时民众崇持《金刚经》活动深入广泛开展奠定了充

分的基础。

第二,作为最流行佛教宗派的基本经典,《金刚经》得到了唐时统治者的突出重视。《金刚经》的开经偈由武则天所作,传说《云何梵》也是她的手笔。^[29]开元二十年,唐玄宗为金刚经作注,修义诀,中书令张九龄赞其为“佛法宗旨,撮在此经”,“敷演微言,幽阐妙键,豁然洞达”,请“降出御文,内外传授”。^[30]统治者的重视,必然会从根本上提高该经的社会地位以及在民众中的流行程度。

第三,禅宗的流行是唐时民众崇持《金刚经》活动深入广泛开展的根本原因。有学者认为,禅宗的兴起,使佛教世俗化进程有所减慢,笔者不赞成这种说法。佛教的中国化进程,是上下层佛教,即教理佛教与世俗佛教至始至终并行发展、相互融合的过程,在佛教世俗化到了一定程度,日益成为一种社会习俗时更是如此,如本文所论述的唐朝。更重要的是,前者对后者往往起到一种指导与推动作用。其一,吸收更广泛的信众是任何宗教的任何层次信徒都坚定认为自身所具有的不可推卸的宗教责任。故上层信仰者有意识的将自身的信仰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内容与形式传播到民间。其二,下层对上层有意识的仿效心理与行为,且这种行为按自身的实际情况加以灵活化。笔者认为,禅宗在唐朝的兴起,一方面确实推动了佛理研究的发展,但事实上也推动了以崇拜佛经为中心的另一种世俗佛教形式的兴起。《金刚经》是禅宗的基本经典,在禅宗兴起的唐代大为流行,其具有短小易持、包含禅宗思想精髓、宣传崇经活动等形式、内容特征。当时的上层佛教信仰者多为禅宗信徒,他们自然将《金刚经》作为改造宣传的首选。作为崇敬三宝之一,这些高层次信徒也有着眼于智慧修持的广泛的崇经行为,接受了《金刚经》的

民众自然会进行效法,并在该经上进行实践,同时进行实用主义、简易主义的再改造,因此,当时佛教上下层信仰者的崇敬《金刚经》活动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后者是前者的简单化与通俗化,如前文所述,较之前者,后者功利色彩过于明显;对仪轨不太重视;忽视教义的掌握;省略为人讲说等较为复杂的形式;二者对《金刚经》的重视程度也有所不同,民众崇经的中心是小部头的《金刚经》,其次是从《法华经》中抽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形成的《观音经》,然后才是部头较大的《法华经》,与此相反,从《续高僧传》等材料反映,唐时上层佛教信仰者普遍崇持的是大部头的《法华经》、《华严经》、《大般若经》以及《大般涅槃经》,短小简单的《金刚经》并未得到最突出的日常崇持。并没有资料表明,唐代民众对这部经典的崇持活动,因形式、仪轨、目的、与佛经关系、重视程度等方面与上层信仰者的崇经活动出现差异,而遭到广泛而有影响力的责难与抨击,相反,民众种种功利、速效色彩浓厚的崇持活动因其信仰的虔诚性而获得了来自上层信仰者的舆论上的褒扬与鼓励,文献中多有此类记载。

笔者认为:禅宗的兴起是唐时以《金刚经》为中心的民众崇经活动兴旺发展的最主要原因。禅宗不是阻碍佛教世俗化的力量,它只是以修持智慧的内核促成了民众中与此相反的外在形式。以实用主义、简易主义为基本特征的世俗化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内在趋势,真正违背、反对此潮流的佛教宗派并不能在中国得以长足发展。唐朝时期民众崇敬尊奉《金刚经》,这一活动及其观念的产生与表现是佛教中国化、世俗化过程中的一个有代表意义的缩影。上文所论述的各部分内容与结论,对当时其他佛经的民众崇持活动大多适用。

注释:

- ①《太平广记》卷105引《广异记》,中华书局1966年版。②《酉阳杂俎》续集卷7《金刚经鸠异》,《说郛》弓部卷116,上海古籍出版社《说郛三种》,1988年版。③《太平广记》卷279引《广异记》。④《太平广记》卷107引《报应记》。⑤《太平广记》卷103引《报应记》。⑥《太平广记》卷104引《纪闻》。⑦《太平广记》卷104引《报应记》。⑧《法苑珠林》卷18,《大正藏》第53册。⑨同注上。⑩同注8。⑪《太平广记》卷107引《报应记》。⑫同注上。⑬同注7。⑭《太平广记》卷106引《报应记》。⑮同注9。⑯《太平广记》卷109引《冥报记》。⑰《太平广记》卷283引《灵异记》。⑱《太平广记》卷103引《报应记》。⑲《太平广记》卷104引《广异记》。⑳同注2。㉑《宋高僧传》卷21《宁师传》,中华书局1987年版。㉒《太平广记》卷104引《广异记》。㉓《太平广记》卷105引《报应记》。㉔《太平广记》卷103引《报应记》。㉕《太平广记》卷104引《广异记》。㉖此处参考南怀瑾先生《金刚经说什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㉗《万缘金刚般若波罗密经集注》,第6页,成都文殊院、东方文化艺术研究所根据北京中央刻经院1940年版影印,1997年版。下文所引《金刚经》原文均引自此书。㉘同注27。㉙《册府元龟》卷51,《帝王部·崇释氏》。

参考文献:

- [1] (宋)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6.
[2] (明)陶宗仪,等.说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 (唐)道世.法苑珠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 (宋)赞宁.宋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 南怀瑾.金刚经说什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6] 万缘金刚经集注[M].成都:成都文殊院、东方文化研究所,1997.
[7]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1960.
[8] 刘惠琴.归义军时期的河西佛教[A].法藏文库硕博学位论文[C].台湾:佛光山文教基金会《法藏文库》,2001.